

有了富裕钱,再有了“富裕闲”,人们开始张罗、琢磨旅游。

从前的旅游者曾以到处涂写“××到此一游”为快。如今涂写者自己也觉得这么干无趣和小气,所以现在各景点已很少见这种宣示足迹的标语。宣示还是要宣示的,用别的方式。我那个极爱旅游的老朋友,卧室里挂了大号的地图和世界地图。所有的来访者必会被邀请到地图前,看地图上的贴纸。凡她去过的城市和著名风景区,都细心贴上蓝色的小旗——算是她脚板或车轮下“沦陷”了的“阵地”。头发由黑变白,腰板由直变弯,她的小旗们也一年年密密麻麻起来。和客人聊天时她最爱说的就是“那个地方我去过”。直到游不动了,还常倚在床头翻阅几大摞旅游相册。这种打开方式,或可称为地图式或“占领”式旅游,其成就以行迹面积计算。重点是每到一处,赶紧自拍购物立此存照,可算是“到此一游”的文明翻版。今日驴友中,这种打开方式的占比应该还提高。

另一路游客遵从的是“味蕾美学”,山川湖海动植物之态都不甚入他法眼,他的脚步驻留在餐厅、夜市、果园菜场、茶坊酒肆。回味旅游的过往,他最爱说的是“那个东西(一种特产或一道菜)我吃过”。没有知名美食的地界恐怕挤不进他的旅游计划。这种打开方式的旅游成就以味觉记忆计,出游前必查好攻略,务求每一顿每一口都能贡献给当地最有口碑的所在。不过如今网购物流发达,想得到想不到的各路特产各地风味纷纷打包送上门来。略花心思,在家甚至可以吃得更有创意,比如呼噜贝尔碳烤羊腿就北京牛街的芝麻酱火烧,上海凯司令的拿破仑配软糯杏皮水,阿根廷红虾澳洲和牛同卷淄博烧烤小饼……若非口味刁钻的老饕,非寻那些过了这村没这店的口味不可,大抵也无须舌临其境,味觉“旅游”和脚板旅游竟可脱钩矣。

工作压力加上长假变短假的改革,让不少家庭远游改近游。不扎堆奔知名景点打卡,找个农家乐,钓鱼采摘喝茶打牌,惬意一个周末。这种打开方式用时少,费用省,不疲倦,也玩了,也歇了,回家上班精神头儿不减,划算。

时兴的团队骑行也可算一种打开方式。曾看到从广西一路骑至云南的摩托车队,男男女女十四五人,三四十岁上下,被连绵两天的中雨阻在路上,在村里头的文化长廊(有护栏有长座椅的那种木顶廊子)借住。对面是一处干净宽大的免费公厕,可以洗洗涮涮;他们带着帐篷和柴油炉,自己做饭,湿衣服张挂在廊子四周。只要时间和精力充沛,这种无须一文宿费的打开方式,体验倒比前几种丰富:游的不是某个地方,而是一段旅程;旅游者体验的不仅是目的地景观,还有沿途风光、旅途轶事和朋友们相互扶持。

旅游这事儿,与读书类似,也有粗细分。走马观花有走马观花之趣,喜欢的地方一去再去,也有反复摩挲品味之乐。

拿大理来说,海拔高,夏天清凉,物产也丰富。我们家去了一次就惦记上了。七年间在那儿过了三个夏天。从梗概读到细节,从风物读到民情。

头一次去,把可以“到此一游”“到此一吃”之处都经历过了,登苍山环洱海,喜洲双廊,古城三塔,鸡枞松茸火腿、饵块、汽锅鸡,白族的傣族的小吃……这就好比第一遍读《红楼梦》,好歹先把关键人物和宝黛爱情悲剧的主线捋清了。

二刷就不打卡了,在洱海和苍山间的村子里随意消磨时光。小外孙也大了,下洱海打水漂,骑马上山,摘野果追松鼠找蘑菇,可玩儿的太多。大理号称自由职业者的天堂,我们住的凤阳邑小村就驻扎了不少艺术家,玩陶泥的,画画儿的,做扎染的。村子也跟着艺术起来。有年头的老屋围着石头垒的院墙,植物们爱怎么长怎么长,墙头冒出个仙人掌,三角梅瀑布或大腿或小股流出来,大捧的野菊花,拥挤着松散着,挺着,歪着,任性撒娇。茶马古道穿村而过,道旁那棵大树下是村里老太太们唠嗑编草帽的地方,我们散步也在那儿歇脚。道上不时有铃铛声,是马帮牵着体验骑马的游客过来。孩子们叫着马来了,马来了跑开去,待马过了又冲着马屁股打赌,这一队是要拐上苍山去呢,还是走到玫瑰园就掉头回来?

体验这些闲散的、人文的趣味,有如重读红楼,不急看故事,而是在某处慢下来,拣些从前忽略的细微处慢慢咂摸,在细枝末节里搜索新东西。如黛玉湘云凹晶馆联句,书中写诗场面不少,初读也就泛观而已。后慢观其选题材(五言排律),定韵(十三元),对仗,用典,互评互赞,忽意识到怡红夜宴写晴雯与宝姐姐同庚,而中秋后宝玉祭晴雯的《芙蓉诔》记她生年“十有六载”,黛玉又小宝钗四岁,则有景、新鲜!”抒发的如红楼梦的创作观:再熟谙古来名作,再擅长押韵用典,好作品靠的还是生活!后文黛玉改《芙蓉诔》,把泛泛的“红绡帐”更为大观园的“茜纱窗”,令宝玉跌脚笑赞,思路也还是从生活中找现成新鲜的细节……

在大理住了两个夏天,和一家民宿主人大聊过,这对摄影艺术家兼当了当地人小院开民宿。院子虽小,可有花

旅游的打开方式

唐 韧

有草有树,有菜园,有小狗小猫,还有一条小石渠,里面游着鱼。屋子里、楼梯上到处挂着主人游历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摄影作品,楼梯拐角处的小书立里可以找到一些当代名家和大陆台港的散文,以及一些翻译小说。下雨天坐在廊子上也不很寂寞了。小院子里有厨房,闲来可以弄点爱吃的。

今年再去大理,又约他家。只是院子租期到了,主人改租另一处小院,还没搬,倒让我们占先,替他们住一个月新居。听女主人说,凤阳邑如今也不大一样了,村中开了不少网红小馆儿,还有懒人做省事生意,门口一张桌,摆几块明码标价的扎染或饮料,再贴个二维码,主客面也不用见,买卖便成了。

新小院在南五里桥头,村口立着上书村名的高大石碑坊,挂着省级民族团结进步村和省级绿美村庄的头衔。进得村来,照样一水儿的石板窄路,灰瓦飞檐白墙的民族风格民居。这里是穆斯林聚集区,离古城近,又临着美食一条街,大约是住着各个清真食坊、火锅店烤店的一众老板们,他们的院子也都草木丰茂,有的还加了照壁门楼,少了枝桠横逸的野趣,多了端庄的盆景和打理齐整的庭院树。

相较于凤阳邑的艺术范儿,南五里桥头虽市井,倒并不俗气,对一个初来乍到的人甚至透着亲切,这或许和院墙有关。院墙彩绘是白族民居的传统,蓝色或黑色的云样花框里缀上一小幅一小幅字画,多是水墨山水,兰梅竹菊,与村子背后不断变动的苍山云雾风格相谐。文字或楷或隶,有的言画,徐几笔兰花,文曰“空谷幽兰”,画一条小溪流,

怀念导师秋山骏

陈喜儒

定评的大家名家,或者如日中天的文坛新秀。为了及时了解日本文学最新动态,保持高层次高水平稳定的交流态势,我们不仅要浏览日本友人寄赠的《海燕》《群像》《新潮》《世界》《小说新潮》等杂志,还不惜重金,订阅了《朝日新闻》《文艺春秋》《文学界》等报刊和部分重要图书。但我不记得秋山先生是《文学》丛书的首席编委,只是实话实说,没想到先生很高兴,不但在序言中谈及此事,还亲自到文艺家协会翻箱倒柜,为我补齐了这套书中所缺的各卷。从此以后,每年选集出版,先生都寄我一册,直至病故。

秋山先生生于1930年,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国文学系,曾任新闻记者,东京农工大学、武藏野女子大学教授。1960年,他的评论《小林秀雄》获《群像》新人奖,一举成名。他的著作并不多,有《中中原也评传》《想象的自由》《无用的告发》《步行和贝壳》《铺路石的思想》《人生的检验》等十余本,是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“内一代”作家群的代表评论家,以探索精神的起源而著称于世。他的文章朴素简洁明快,单刀直入,犀利辛辣,既有评论家的深刻、缜密、凝重、敏锐、渊博,又有散文家的精致、激情、真诚、坦荡,风格独特,自成一格。

大约在1991年前后,中日两国作家在座谈中经常谈及纯文学,但在理解上却大相径庭。比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张洁的《沉重的翅膀》,山崎丰子的《浮华世家》,渡边淳一的《花葬》等,中国作家认为是纯文学,而日本作家却认为是大众文学。把中日文学稍加比较,就会发现,中国的所谓纯文学,大部分属于日本大众文学的范畴,中国的通俗文学与日本的大众文学大体相同。这种概念和内容的交叉和混淆,成为中日文学交流的误区,所以我想,只要搞清楚什么是日本的纯文学,就可以扫除交流中的暗礁。1995年春天,我写信向先生请教:日本纯文学这个概念是谁,何时提出来的?是否有准确的定义?日本纯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?目前日本纯文学的状况如何?

信寄出后,我又后悔不迭,因为在先生的著作中,未发现与此有关的文章,想必不在先生研究的范围之内。而且我提出的这些问题,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,需要花费很大精力,查阅大量资料,才能得出结论,但覆水难收,只好听天由命。

没想到,仅过一个多月,就收到先生从东京发来的洋洋近万言的特快专递。估计先生接到我的信后,马上停下手边的一切工作,全力以赴,解答我的问题,他说:

纯文学没有定义。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诗人、评论家北村透谷(1868—

1894)在《何谓干预人生》(1893年)一文中提出来的。

那么,什么是纯文学呢?横光利一(1898—1947)在《纯粹小说论》中说,纯文学就是私(我——作者注)小说。

久米正雄(1891—1952)说“一切艺术的基础都是‘私’”,所以作家赤裸裸地、原汁原味地描写“私”,才是艺术的正道、基础、真谛。

小林秀雄(1902—1983)在《私小说论》中也说,描写“私”,就像卢梭的《忏悔录》一样,是文学新的发现。描写“私”,就等于不断地探索“我是什么”。尽管私小说是作家描写自我的作品,但又不完全局限于作家个人的生态、感觉、日常琐事。私小说作家真正的追求是以自己为素材,探索人生的底蕴、生存的真正价值和意义。

以上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原本是某一时文学高峰论坛上的特殊话题,是极为冷僻孤独的思考。一般的读者和知识分子可能没有一个人想过巴尔扎克、司汤达、托尔斯泰、福楼拜、陀思妥耶夫斯基,写的是“通俗小说”……

战后,即五十年前,纯文学等于私小说的说法就已经消失。我认为现在日本所说的纯文学,在概念上与中国的纯文学可能没有太大差别。

收到先生的信后,我马上译成中文,摘要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(1995年7月19日)和《文艺报》(1995年9月29日),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日本的纯文学。先生也把这封信发表在《群像》杂志,并收入他的散文集《一粒沙子的记录》中。

1996年秋,我应邀赴日进行中日纯文学比较研究,并请先生做我的指导教师。说句老实话,在先生访华之前,我没看过他的文章,而且对一些云山雾罩的评论家也无好感,但我日本作家的目光中,读出了他的价值和分量。以至后来读其人,读其书,投其门下,做他的学生。先生很热心,为我开列书目,介绍我去讲读社资料室查阅资料。是年,先生的长篇评传《织田信长》连获野间文学奖、每日出版文化奖两项大奖,一时洛阳纸贵,一册难求。我去花店选了一盆最贵重的蝴蝶兰表示祝贺,先生很高兴,回赠我一瓶家礼炮21年苏格兰威士忌。先生爱酒,这瓶美酒不知珍藏了多少年,自己舍不得喝,送给我这个滴酒不入口的人,实在是明珠投暗,本想还给先生,又怕失礼,回国前,我请好友把酒喝掉,留下瓶子做纪念。

研究中,不时遇到一些问题,需要请教,但先生很忙,一是在大学教书,二是为报刊写文章,三是参加出版社、文学团体的评奖工作,见一次不容易。先生告诉我,他在获注的读卖新闻文化中心有个文学讲座,每月去两次,可到这

文曰“枕石漱流”;有的写景,“苍洱毓秀”“皓月千里”,文采更好一点的还有“岩高千丈虎,松老一山龙”;也有表达为人处世的理念,如“谨言慎行”“与人为善”“澹泊明志”“宁静致远”……也不知是主人家刻意挑的,还是写学的秀才们自由发挥的。

彩绘之外,不少院墙上还挂了署名“大理市妇联”的木牌。比起常见的“五好家庭”,这些木牌的表扬对象要具体许多,如“好婆婆”“好儿媳”以及“双合格家长”。各家门口偶有自家张贴的文字:门框上贴了白对联“生前记得三冬暖,死后思量六月寒”,该是刚走了老太太;大门上贴了“马、马姓喜寓”,这家小两口刚结婚,且都姓马。某家墙外巴掌大一处菜地,也郑重其事挂了牌子,上书“赵大姐菜园”。

城里小区多年邻居也不见得都知道姓氏名谁。到了这儿,从村头走到村尾,单看墙上这些文字,左邻右舍就能了解不少,这是村庄的社会生态。

对于游客,有两条白底红字的外墙标语更让人印象深刻,一条是:

各民族都是好兄弟,好兄弟都要过好日子



一条是: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

是村委会党支部“宣”的,却没有硬铮铮的政治词汇,人情味满溢。

村口常有吆喝“卖——刺(cì)鱼!”的,他卖的是鲫鱼,分两桶,一桶养殖的,一桶洱海里捞的。鱼都活蹦乱跳,煮汤挺鲜。那天他正吆喝着,同村一个小伙子骑着三轮路过,回头学着他的腔调喊“卖——死鱼!”,卖鱼的笑着回道“再乱叫看我不撕了你的嘴!”这是属于村道边的笑谈。

大理是熟悉的,但在某个村里呆上一阵,仍会这里那里窥见一点新鲜的,以前未曾注意过的风土民情,这不也是一种旅游的乐趣吗?

旅游打开方式不同,并无高下尊卑之分,但不同的打开方式会让人对一个地方有不同感受。在你的回忆里,它是地图上名号响亮的一个点,还是你身后的背景板,或是反射性地咽口水,又或是层层叠叠的许多故事,取决于你的打开方式。

妹妹曾说她才去过大理,抱怨人又多又挤,商业化很严重,一点儿好感也没留下。我猜想她多半住了古城,逛了那些扎堆卖纪念品、小吃和民族服装的店家,目之所及尽是过度包装内容雷同的各种“特色”,耳边充斥着旺季的人声鼎沸和风格各异但揉在一块儿的氛围音乐,走道还免不了要停下来候着拍照的游客摆各种pose。年轻人或许爱这种热闹,对退休多年的她来说,这样的打开方式显然不对路,难怪她闹心了。

秋山骏先生去世快十年了,我很想念他,总觉得他没有走远,眼前常常浮现他酒后微醺的笑容。

初见先生,是1990年秋天,他参加日本作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。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,处处感到新奇,眼中闪着孩子般天真兴奋的光。在中日作家座谈会上,问及日本文学流派、思潮、动态或作家作品时,团长、小说家三浦哲郎先生就请秋山先生回答。他高屋建瓴,言简意赅,三言两语就能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。不仅中国作家,连在座的日本作家也频频点头,表示赞许钦佩。

一路上,我曾就日本的中间文学、“新人类”文学、历史小说与时代小说的区别,特别是有关争议的作家与作品等敏感问题请教先生,他的回答总是毫不隐讳,一针见血。很明显,先生对于这些问题都曾认真地思考过,胸有成竹。比如在日本文学中有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,它们都以历史为题材,如何区分界定?他说历史小说是纯文学,是用现代目光解析历史,依靠的是知性。时代小说是通俗文学,用民族神话梦想和英雄故事构建历史,依靠的是想象力。在交谈中,我发现先生目光犀利,学养深厚,对日本文学史、西方文学史,了如指掌,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。但他如同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,如果不问他那一亩三分地都有什么奇花异草、瓜果梨桃,他就像个闷葫芦,一声不响。

那年秋天,先生回国后撰文说中国使他感到亲切,他爱上了中国,并且在



神思·遨游(国画)李 昂

我有厨师解鱼时那种明快、神气、优美吗?他在观察点心师制作日本点心时,心里想的还是他的评论:我终于明白,一个日本人如果不接触日本的古典、日本的短歌俳句,语言很难成熟。日本点心集日本自然之精华,可以说是日本古典文化的味觉化。每一块点心,就是一首日本短歌,一首俳句。日本点心可能是以无形的、眼睛看不见的、日本人生活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为原料,提炼精制而成。

但是,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,自己属于哪个阶层,是富是穷,他却说不清楚。本来,他无房无车无儿无女,与妻子一直住在1956年租赁的两间一室的单元中,起初连个窗帘也没有,挂的是一条床单。有时买不起菜,就把海带用剪刀碎碎蘸酱油下饭。但这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的文化名人却从不怨天尤人,而是随遇而安,只要有书读,就心满意足。他在《我是穷人吗》一文中说:什么是贫穷呢?很久以来,我一直搞不明白。我时常想,我算不算穷人呢?他经过一番分析对比之后认为:我不穷。

在我准备写论文时,先生看了我的提纲后说,论点太单调枯燥,不如写散文随笔,讲述你在日本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,更有价值。当时我也正在犹豫,绞尽脑汁写就的论文,即使侥幸发表了,没有几个人看,又有什么意义呢?先生的意见,正中下怀,于是决定用散文的形式,写我眼中的日本作家与作品,后结集为《樱花点缀的记忆》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我请先生赐序,没想到先生寄来的序文由著名小说家黑井千次、高井有一和他,三位日本艺术院院士共同署名。我虽然喜出望外,但也诚惶诚恐。日本艺术院,是日本政府为发展文化事业,表彰在艺术上有卓越成就的艺术家并给予优厚待遇,于1907年成立的特设机构。院士为日本最高艺术称号,定额为120人,终身制,去世一位补一位,其中包括绘画、书法、雕塑、建筑、小说、诗歌、评论、翻译、戏剧、音乐、舞蹈等诸多门类,获此殊荣的作家评论家大概也就七八位而已。先生在序中称我为日本作家的珍贵的朋友,说“这些文章是作者依据自己的观察、思考和印象而描绘的日本作家群像,想必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,同时对于了解日本文学也有重要价值和意义”。我何德何能,得此谬赞,实不敢当。

2011年秋,我去日本写《野间宏论》,住在热海,有一次去东京参加中日作家座谈会,见到了先生。他面色憔悴,精神萎靡,脚下无根。他说前年大病一场,险些丧命,现在已遭医嘱戒烟酒。我知道烟酒不仅是他的嗜好,也是点燃他智慧火花。如今火花熄灭了,他的生命也失去了活力和光彩。我握着他冰凉的手,本想安慰几句,但什么也说不出来,只是强忍着,不让眼泪掉下来。幸好这时黑井千次先生走过来,说他原来有许多野间宏的资料,没地方放,都捐给了日本近代文学馆。如果需要,他可介绍我去查阅……

2013年10月2日,秋山骏先生病故,但他的师道恩德,永远滋润温暖着我的心灵。